

全球化:21 世纪的大趋势

Globalization: Main Tendency in the 21st Century

李慎之

(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 北京 100732)

一般来说,我不认为世纪之交或者千年之交对人类历史有什么特殊意义,因为我不相信耶稣的生日会对人类历史形成每一百年或一千年的周期或阶梯。但是当我们现在正要走出 20 世纪而进入 21 世纪的时候,世界形势却确实表现出急剧变动的症候。我们只知道其广度与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却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概念和理论来描述和把握它。可以说这样的概念和理论还没有产生,我们只能笼统地说,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

“迎接全球化时代”是 1992 年我在北京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 5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言的题目。严格地说,全球化的开始应该上溯到 1492 年。在那一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使东半球和西半球的居民知道了彼此的存在,使人类知道了自己确实是同住在一个不可分割的圆球上。这当然是全球化进程的起点。从此以后,全人类各部分的交往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当然少不了激烈的冲突和战争)。但是,无论怎样说,这种交往大体上是以国家和民族为主体进行的。全球化的端倪不时隐隐出现,比如科学和技术的传播,宗教和文化的交流,尤其是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等等。不过总的来说,这种交往还不能越出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8 年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因而我们只能把这 500 年的历史称做“国际化”的时代。只是到了 500 年之后的 1992 年,人们才感到出现了一种全球性的力量在裹胁着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个集团,以至无数个人进入一个汹涌澎湃的大潮流。用一句术语说就是“世界系统已达到全球维度”。这种情况使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感到了两千年前亚里士多德说的“全体大于部分的总和”这句话的力量,使我们不能不用“全球化”这个词儿来形容世界正在进入的一个新时代。

形成这种感觉的一个突出的标志是,1989 年底华沙条约集团的瓦解和两年以后苏联的瓦解。一个

几乎是人类史上最大的军事—经济—政治集团和一个几乎是人类史上最强的军事—工业—科技大国,没有经过战争,没有经过外敌的强攻,在短短几十天的时间内就突然像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崩坍了。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难怪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在去年年底回顾一年国际形势的时候,还要专门提到这个事实,而且惊叹“这中间必定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

解释这样奇特的现象当然要借助于内因论,但是内因只是必要条件,还不是充分条件。内在的矛盾也得有环境的力量才能如此急速地、戏剧性地爆发。可惜现在还谁也不能作出全面、精确的分析。我们能够有把握提出来的只是:一、市场经济的力量冲垮了一个僵化的体制;二、信息的传播冲垮了一个封闭的系统。进一步的研究还有待于将来,然而,未来的历史学家很可能会说 21 世纪是在 1989 年开始的,就像今天的历史学家说 20 世纪是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开始的一样。

一、

历史学家出于职业的需要而不能不热中于寻找历史的转折点。但是历史本身实际上是一刻不停地一点一滴积累而形成的。从 500 年前哥伦布把东西两半球捏合在一起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局面,首先是交通发达的结果。哥伦布当年冒死犯难要走 70 天的航程,今天的喷气式客机只要几个小时就能完成了。物资、人员、信息,现在是在全球范围内交流,规模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一个一个边界,不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不是被冲破就是被越过。这种由于科技的发展与经济所形成的力量是促成全球化的正面力量。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我们中国人已经相当理解,而且有切身体会了。当年开始搞乡镇企业或者私营企业的创业者,恐怕谁都没有梦想到会把自己的产品销到外国去,而今天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这样做,而且深感非这样做不可。根据历史发展越来越快的原理,用不了多少年,全球化就会成为中国企业家们普遍的常识了

促进全球化的还有一种反面的力量,那就是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对地球生态(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资源趋于枯竭,甚至从来没有人以为会发生问题的土地、水和空气也已被污染而不适于人的生存了。人类现在是生存在危险的边缘上。如果这种趋势不被制止,那么人类的末日可以说是指日可待的。因此,自从60年代以来,先进的人们就发出了“救救地球”的呼号,这是人类出现在地球上几百万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要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协调一致的努力不可,也就是非有全球化的努力不可。除此而外,科技与经济的进步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人类最早认识到自己有可能被毁灭的危险是在40年代原子弹制造出来以后,虽然大家在核恐怖平衡下提心吊胆地享受了50年的世界性和平,但是现在世界上积存的核武器仍然足够多次消灭人类而有余。而且核技术与核武器正在迅速扩散,不用很久,就会有许多中小国家甚至私人工厂制造出核弹来。除了核危险以外,科技—经济进步提高了人的生活水平,却促成了人的放纵,而并没有教会人如何正确地生活。当前这个时代的另一面是人欲横流,道德败坏。饥饿与瘟疫、奢侈与浪费并存;艾滋病与海洛因、犯罪与恐怖,现在是在世界范围内流行。人类要制止自己的恶行,维护自己的幸福,也非得通过全球性协调一致的努力不可。

今年1月20日,美国新总统比尔·克林顿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说:“国外与国内今天已经没有清晰的界限了——世界经济、世界环境、世界爱滋病危机、世界军备竞赛影响到我们所有的人。”这个战后才出生的年青人算是意识到了他的先辈前任所没有意识到也不能意识到的“令人望而生畏”的问题。

还有一个较少为人们注意的全球化的力量。就是所谓第四次产业革命,即开发天疆的事业。照这种看法,新技术革命已经把人类的活动推进到宇宙空间,人类将向外星进军。这不但是出于人类的进取心,也可能是出于逃脱地球上未来灾难的必要。这种话听起来近于幻想,然而却也不能绝然地否定。如果人类真有这样的一天,人类作为整体,当然会像历史上一个一个的民族那样紧密地团结起来,从而大大加速全球化的进程。

二、

可以称为“全球学”的学问早在60年代就出现了。当时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一群学者就开始了

对世界人口趋势、资源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到了70年代,许多国家的政府,再加上联合国也都设立专门机构,聘请专门人员进行研究来了。同时由于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混沌论等新兴学科的建立,也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在方法与手段两方面都得到了强有力的工具,而广义进化论与一般系统论则提供了理论的框架。应该说这种研究在专题上取得的成就已经很不少了,向人类一再发出的警告就是其特出的标志。但是预测国际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的发展却是更加复杂、更加困难得多的事情,它迄今为止还只能是国际关系学者与世界政治家内心“神而明之”去感觉、去把握的事情。

当前世界上灼然可见的大趋势是市场经济将席卷全球。确定市场经济“竞技规则”的关贸总协定将把其影响伸展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中国如果能在今年入“关”,将是对全球化的一个重大推进。经济集团化(如所谓美、欧、日三大集团)也是当前世界上明显而突出的现象。有一种看法认为它是全球化的障碍,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更应该看到它只是全球化的一个阶段。恩格斯所说的“至高的经济力量”决用不了形成集团化所花费的半个世纪的时间,就会胀破这些集团的边界。欧洲统一大市场刚刚在今年元旦建立,到一月底,德国工商大会主席就已经提出要建立欧洲—美国的内部市场了。正如他所说:“企业的兴趣已经超出地区经济联合的范围了。”

与经济力量平行发展的是观念的力量。现在已经有同志说到科学的世界化,这是不争之论(当然即使是自然科学这种最为中性、最富共性的东西,要完全彻底地全球化也还得经历一段时期)。同样重要的是某些价值观念的全球化。就维持当前世界的和平与社会的安定来说,这并不完全是好事,它在各个社会内部引起的冲决藩篱的作用恰好就是目前各种混乱与苦难的原因,然而这毕竟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过程,是旧秩序破坏以后重建新秩序的一个必然阶段。近几年来世界上最强大而迅速发展的意识形态是以原教旨主义为中心的泛伊斯兰主义。但是,就在原教旨主义中心的国家,现在也为通过各种媒体(如广播、电视、电影、出版物、录像带等)而涌进去的外来信息所苦恼,因为它对既存秩序具有侵蚀性、破坏性。就是在一向自以为领导世界新潮流,一向向全世界各国推销其价值观念的美国,现在也一样进入了人口—社会—文化结构大变动、价值观念大混乱的时代。它的领导人两年前倒也曾志得意满地夸口要建立世界新秩序,但是没有多久就自己吞了回去。他们不但看到了在世界范围内还不可能出现他们心目中的秩序,也看到了美国内部也不处于可以维持他们心目中的秩序的状态。无官无职如基辛格这样的人就能直说:“在这个时代,冲

突是国际新秩序的痛苦的开端。”

尽管我们无法预言全球化的政治与经济后果，但是可以肯定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主体与行为准则都要大异于今日，而决不会像过去的变动那样仅仅是在现有的民族和国家之间实行一下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国家、主权、国界的概念都会有变化，而非国家的主体，如国际组织和跨国企业的影响则将大大上升。另外，各个国家的内部因素，包括个人的选择、个人的价值观也将在国际关系中起越来越大的作用。用旧时的尺度来看，简直可以称为狂潮一样的移民趋势，只是这种变化的一个迹象而已。

三、

有历史意识的人，尤其是相信唯物史观的人，当然欢迎全球化的大趋势，认为它是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且是人类的必然归宿。从长期来看，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短期来看，却可能是世界上相当多的人会觉得难以接受的。千万不能简单地把全球化等同于一体化或者大一统，至少现在还不能。对目前的形势可以打一个简单的比方，许多本来是被堤坝隔开的水域，现在由于堤坝的溃决而形成一片汪洋。一时只见水深浪阔，波涛汹涌，还看不出风向和潜流的归趋。事实上，在1989年以后，这个世界上最突出的新现象是民族主义、教族主义、种族主义、部族主义，以至地方主义的爆发，因此而使人感到我们已迎来了一个新的战国时代。上点年纪的人还记得这种言论曾出现在4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学术界。不过当时的论者也曾预言，接着战国时代而来的将是大一统，后来的历史发展出来了两个阵营、三个世界的局面，多少印证了一点原来的猜测。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全球化的力量与全球化的需要都比50年前要强很多，但是在世界进一步整合以前，还先得对付由于旧秩序的崩溃而释放出来的各种力量争衡所造成的分裂和混乱。

对这种混乱，可以有三种态度。一种是在其中感到解放的愉快，做一个中国古来赋以贬义而在今天却以褒义流行的“弄潮儿”。这种人在客观上可能是历史潮流的推进者，也可能是历史潮流的破坏者；在主观上可以感到畅意，也可能招致失意。一种

是抱住原有的利益与观念，顽固地反对一切新生事物，他们很难说有多大的进步作用。还有一种是努力弄清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机制，努力引导社会向合理的、有序的方向发展，具体地说就是要为急剧变动的社会制定法律的和道德的规范。前两种态度及其行为方式多少是自发自流的，后面的一种就要求极大地发扬主观能动性。虽然从历史发展的总体来看，做这种事情的人永远只是少数。所谓“乾坤几个有心人？”我们却不能不希望这样的仁人志士在中国能越来越多，使全球化的进程和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进程能够较为顺畅而较少痛苦。

如果我们对所谓“文化”取较窄的定义，即不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而仅指其经济基础以外的上层建筑的话，上面所说的工作也就是文化工作。

文化可以是一种极大的革新力量，也可以是一种极大的稳定力量。在世界处在空前未有的转型期间，我们既希望它是一种革新力量，也希望它是一种稳定力量。对于占全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来说，我们的一个突出任务，就是要使我们这个社会一方面在改革中进步，一方面能继承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发展出新的价值系统与行为规范来。

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一份极其重要的遗产。虽然历代的人们都自以为很聪明地看破了天下没有多少人有多少事情是照圣经贤传做的，但是，要抛弃这个规范另起炉灶来引导12亿人进入一个全然陌生的规范，却只能增加更大的混乱。历史的经验不远，我们应当记忆犹新。中国哲学的最高原则是《礼记》上说的“人者天地之心也”。中国古圣先贤给自己制定的最高任务是“参天地、赞化育”，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与当代广义进化论所指出的方向是完全契合的。我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正如同生物进化一样，有其自复制能力、自组织能力、自创造能力。不管我们面对的变化是多么地“令人望而生畏”。我相信经过广泛的混乱而出现的将是一种广泛的秩序。我希望值此世纪之交的讨论能够引起广泛的注意，产生广泛的感奋，形成推动中国顺顺当当地加入全球化大潮的力量。确实可以说，攸攸万事，唯此为大。

(责任编辑 蔡德诚)

(上接第28页)

议的建议。组委会确定会议中心议题和会议执行主席。会议执行主席提出评述性报告人和专题发言人，并主持会议，贯彻会议精神和原则，引导会议进行深入、有效的自由讨论。

与会人员

每次活动都邀请不同学科领域的科学家参加，形成多学科讨论。在总体上，与会人员应有一定的代表性。

任何科学家都可向组委会提出参加会议的申请。

举办好香山科学会议并非易事。但我们相信，只要坚持科学精神，经一个过程，香山科学会议一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 蔡德诚)